

桑弘羊

SANGHONGYANG

安作璋著



桑 弘 羊

安作璋 著

中 华 书 局

1983年·北京

桑弘羊

安作璋著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石景山区中华书局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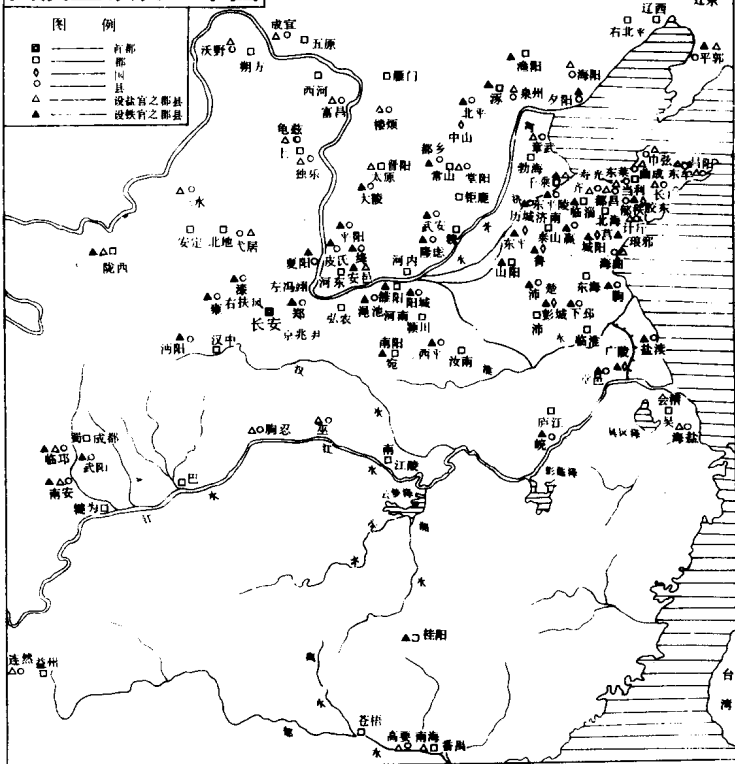
787×1092毫米1/32·3 印张·59千字

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册

统一书号: 11018·1124 定价: 0.26元

西汉盐铁官分布图



目 录

一、从“洛阳贾人子”到皇帝侍从	1
二、任侍中的二十六年	7
三、出任大农丞	20
四、从治粟都尉到大司农	35
五、降职留任	49
六、辅政大臣之间的矛盾	57
七、盐铁会议上的斗争	64
八、悲剧的结局	83
附录：桑弘羊生平大事年表	87
后记	89

一、从“洛阳贾人子”到皇帝侍从

西汉景帝四年(公元前153年),桑弘羊出生在洛阳的一个商人家庭里^①。

洛阳地处黄河中游,形势便利。西周初年,为了加强对东方的控制,在这里营建洛邑,作为周天子的东都。洛邑居民主要是商朝的“顽民”,所谓“顽民”就是反抗周朝统治的商朝旧贵族,他们亡国以后,仍然保持着商人以富为贵的旧俗,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周平王东迁,洛阳又成了春秋时代东周的首都。到战国时代,洛阳经过了几百年的经营,已逐渐发展为一个著名的工商业城市。东到齐鲁(今山东),南到梁楚(今河南、湖北),都有洛阳商人的足迹。《汉书·地理志》叙述洛阳一带的民俗说:“周人之失,巧伪趋利,贵财

① 关于桑弘羊的生年,诸书说法不一。《史记·平准书》说:“弘羊,洛阳贾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又《盐铁论·贫富篇》载桑弘羊的自述:“余结发束脩,年十三,幸得宿卫,给事辇毂之下,以至卿大夫之位,获禄受赐,六十有余年矣。”这两条记载都是说桑弘羊开始做官时为十三岁。他的自述是在盐铁会议上的发言,盐铁会议召开于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由这一年上推,至武帝即位之年(景帝后三年正月死,武帝即位,时为公元前141年。是年十月,武帝始改元为建元元年),恰巧为六十一年,与桑弘羊居官的年数大致符合。诸书均未言桑弘羊事过景帝,故其任侍中时,最早不能超过景帝后三年正月,即公元前141年。从这一年再上溯十三年(古人用虚岁),为景帝四年(公元前153年),即是桑弘羊的生年。

贱义，高富下贫，惠为商贾，不好仕宦。”这种民俗所反映的既不是劳动人民的观点，又和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封建官僚士大夫的观点不同，而应是在商人中间流行的一种唯利是图的思想。

战国时洛阳出了一个著名的纵横家^①，名叫苏秦。相传他年青时候，曾经跟着一位隐士鬼谷先生学道，在外面混了几年，结果是很不得意，贫困而归。他的兄嫂弟妹甚至他的妻子都瞧不起他，并且讥笑他说：“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今子释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后来，苏秦挂了六国相印，富贵还乡，他的兄弟妻嫂又都争着来恭维他，在他左右奔走应奉，甚至不敢抬头看他一眼。苏秦笑谓其嫂曰：“何前倨而后恭也？”嫂委蛇匍匐以面掩地而谢曰：“见季（指苏秦）之位高金多也。”苏秦喟然叹曰：“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②这个故事可以作为上引《汉书·地理志》中那段话的注脚。风俗厚薄，往往能反映一个社会的侧面，这个故事也不例外。嫌贫爱富，见利忘义，本来是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但是成为一种社会风尚，这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有一定的联系。

① 纵横家，战国时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策士。《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主要人物有苏秦、张仪等。《淮南子·览冥训》高诱注：“苏秦约纵，张仪连横，南与北合曰纵，西与东合为横。”秦西据关中，而燕、齐、楚、韩、赵、魏并在山东，地亘南北，故六国联合拒秦曰合纵，六国分别事秦曰连横。苏秦主张合纵，张仪主张连横，故有纵横家之称。

② 《史记·苏秦列传》。

洛阳是商人云集的地方，被尊为商贾祖师的白圭就是洛阳人，他是战国末年依靠囤积居奇起家的著名富商。他认为经商好比孙(武)、吴(起)用兵，商鞅行法，其秘诀是“智、勇、仁、强”四个字。“智”就是要有权变，会弄虚作假；“勇”就是要有决断、有魄力；“仁”就是要能做到“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也就是别人嫌弃不要的东西用贱价买进，别人急需的东西用高价卖出；“强”就是要看准时机，遇到有利时机就如同凶猛的鸟兽扑食一样牢牢抓住不放^①。象这种讲究囤积居奇、掌握时机以买贱卖贵的经济思想，大概也只有商品经济比较活跃的情况下才可能产生。

汉朝建立之初，一则是经济凋敝，二则是法令松弛，于是一些追逐市利的商人便乘机大肆活动起来。他们专门作投机生意，买贱卖贵，以致物价飞腾，米一石值万钱(汉代平时米价一石三十钱)，马一匹值百金(汉代一金，即黄金一斤，值万钱；百金相当于平时中等户十家之产)。当时洛阳有一个大运输商名叫师史，他拥有一百多辆货车，活动范围，遍于各郡国^②，后来积累资金多到七千万。

随着汉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洛阳在经济上的地位显得更为重要了。西汉时，洛阳已有五万多户，约三十万人口，它和河北的邯郸、山东的临淄、四川的成都、河南的宛(南阳)，并称为当时“富冠海内”的名城。

^① 《史记·货殖列传》。

^② 汉初郡和国同为地方高级行政区划。郡直属中央，国由分封的诸侯王统治。景帝以后，诸侯王的权力被削弱，仅存国名，事实上由中央派国相掌管地方行政，国相等于郡守，国与郡已无大差别。

桑弘羊既生长在商业发达的洛阳，又是商人家庭的子弟，童年时代的家庭教养和社会环境的熏陶，必然要给他一些影响。据说他十三岁的时候，在计算方面便已达到了相当熟练的程度。那时候，一般商人计算数字都要用筹码^①，而桑弘羊可以不用筹码，只要“心算”就行了。

景帝后三年（公元前141年），也就是在他十三岁那一年，汉武帝刚刚即位，桑弘羊就被召进了宫廷，做了武帝的侍中。侍中为加官，从列侯、将军、卿、大夫、将、都尉、尚书、太医、太官令（主皇帝膳食），直到郎中，都可以加官为侍中。侍中原是皇帝的宫中侍从，汉武帝时为了强化皇帝个人的权力，以限制丞相的权力，选拔了很多有才能的人到他身边作侍中。这些人可以出入宫廷，和皇帝的关系很密切。其中有的人可以参预议论国家的政策；遇有重要政事，皇帝还常常让他们和朝廷上的大臣进行辩论，“大臣数诎”^②。例如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闽越举兵围攻东瓯，东瓯告急于汉。时武帝年未二十，以问太尉田蚡，田蚡以为越人互相攻击，本为常事，又数反覆，主张不去救援。中大夫侍中严助诘蚡，认为“今小国以穷困来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愬，又何以子万国乎？”帝曰：“太尉不足与计。”乃遣严助以节发兵会稽，浮海救东瓯^③。又如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西汉在河套地区筑朔方城，以御匈奴。当时任御史大

① 筹码，古代计算的工具，一般是竹制，长六寸，上面刻有数字，以便运算，所以称为“筹算”。

② 《汉书·严助传》。

③ 同上。

夫的公孙弘多次上书，以为这是“罢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武帝派中大夫侍中朱买臣等和公孙弘辩论，“发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谢曰：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愿罢西南夷、苍海，专奉朔方。”^①以后公孙弘为丞相，又奏民不得挟弓矢，光禄大夫侍中吾丘寿王对以为“大不便，书奏上，以难丞相弘，弘屈服焉。”^②这说明，在武帝时逐渐形成了中朝与外朝并列的局面。由皇帝及其亲近侍从组成的中朝，事实上成了决策机关；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只不过是执行的机关。侍中虽然名义上是皇帝的侍从，但在政治上却是实权派。如果得到皇帝的赏识，是很容易越级升迁的。例如前面提到的朱买臣等人，以及当时名将卫青、霍去病，还有和桑弘羊同时的霍光，都是以侍中出身而后贵盛一时的人物。所以侍中自然便成了当时人们追求仕进的目标。

桑弘羊是怎样进入宫廷，又是怎样成为武帝侍中的呢？史书对此事没有明文记载。按照西汉官制，在西汉前期，做官的主要途径是到中央政府为郎。郎的职务是负责守卫宫廷门户，皇帝出行时担任仪仗扈从。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等，多至千余人，实际上是预备官员。二千石^③以上的官吏，任满三年，可以保举子弟一人为郎，叫做“任子”。家产在五百万钱以上，自备车马衣服，也可以到京师为郎，叫做“赀（资）选”。从桑弘羊的家庭出身来看，他大概是通过后一条

① 《汉书·公孙弘传》。

② 《汉书·吾丘寿王传》。

③ 汉制，官吏级别以所得俸禄多少为准，郡太守、诸侯王相都是二千石官，月俸百二十斛，当时人在习惯上往往称他们为“二千石”。

途径即以资为郎，而后再加官为侍中的。桑弘羊初为侍中时，年令还很小，而且武帝刚即位不久，还没有把政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朝的班子还没有形成，因此这时候的桑弘羊也只能充当一个普通侍从的角色，不可能参预国家大事。但由于他久任此职，长期生活和工作在武帝身边，深受武帝思想的影响和教育，使他逐渐成为武帝的得力助手，先是“以计算用事侍中”，而后由于工作的需要，又被提拔为国家的财政大臣。

二、任侍中的二十六年

桑弘羊任侍中长达二十六年之久（从景帝后三年初武帝即位至元鼎二年，即公元前141年至前115年）。在这期间，就他本人的情况来看，几乎一直是默默无闻，史书上很少关于他的记载。但就这二十六年的历史来看，却有许多重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对桑弘羊的一生事业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对我们了解桑弘羊一生的功过也有很大关系，因此有必要在这里先作一番交待。

桑弘羊初为武帝侍中时，距汉朝建立已有六十多年，地主阶级政权逐渐巩固，国内基本统一，社会经济也有很大的好转。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里描写当时的情况说：“至今上（指武帝）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廩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集解》韦昭曰：“巨万，今万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封建国家呈现着一派繁荣富庶的景象。

但是与此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许多矛盾，有些矛盾开始显露出来了，有些矛盾发展起来了。这些矛盾，归纳起来，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地主阶级在汉朝“放任无为”政策之下，发展很快，他们依仗政

治和经济势力兼并农民，横行乡里；封建国家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也越来越重，农民贫困流亡，阶级矛盾有逐渐激化的趋势。二是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皇帝以下，贵族、官吏、富商、豪强都是地主，他们有共同的阶级利益，但在榨取农民的劳动果实的过程中，由于分配权益的不平衡，也存在一些矛盾，有时矛盾还十分尖锐。三是汉朝和边境少数民族的矛盾，尤其是汉与匈奴的矛盾，在当时最为突出。上述三类矛盾，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制约、互相影响的。

汉武帝即位之后不久，便利用了汉初七十年间劳动人民所创造的大量物质财富，针对上述矛盾，在政治、经济、思想、军事以及民族关系等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这些措施有些是适合了社会的需要和历史发展的趋势，但同时也给人民带来许多痛苦和灾难。其中耗费民力最大、影响最深的就是他对边境少数民族的用兵，特别是连年对匈奴的战争。

那时候，在中国境内和汉朝为邻的有许多少数民族。在东南方有越族，越族分布地区很广，在今浙江南部沿海地区的叫做东瓯（或称东海），在今福建沿海地区的叫做闽越，在今两广一带的叫做南越（当时南越还包括越南一部分）。东瓯、闽越和南越在秦朝时候已并入统一国家的版图，秦亡以后，又分裂成割据的独立王国。汉景帝时，吴、楚、赵、胶东、胶西、济南、淄川等七个同姓诸侯王联合发动叛乱，东瓯的统治者曾帮助吴、楚七国反对汉朝中央政权，后来感到七国力量孤弱，又受到汉朝中央政府的贿赂，乃倒戈击杀吴王刘濞。刘濞的儿子逃到闽越，怂恿闽越王攻打东瓯。汉武帝

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闽越派兵围攻东瓯,东瓯告急于汉。武帝派遣严助持节发会稽郡兵浮海往救,汉兵未至,闽越已撤围。东瓯王为了避免闽越的威胁,乃自愿举国内迁,汉政府把他们安置在江淮之间。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闽越王又发兵攻南越,南越也向汉朝求救,武帝遣王恢出兵豫章、韩安国出兵会稽,往救南越。闽越王郢准备据险抗拒,其弟余善看到汉兵来势很猛,估计闽越不是汉的对手,乃杀死王郢归附汉朝。武帝封前闽越王无诸之孙丑为越繇王,不久又封余善为东越王,分别统治闽越故地。

西汉时期在祖国辽阔的西南地区(今四川、云南、贵州西南)散居着许多语言和风俗习惯不同的少数民族,汉朝统治者统称他们为“西南夷”。其中较大的有夜郎(今贵州桐梓一带)、滇(云南昆明一带)、邛都(四川西昌东南)、笮都(四川汉源东南)、冉駹(四川茂县一带)、白马(甘肃武都一带)等。很早的时候,巴蜀地区的汉族人民和西南各族就有着经济上的往来。巴蜀的商人经常用不等价交换的手段,从那里掠取僰僮、笮马和旄牛;巴蜀的商品如蜀枸酱、蜀布、邛竹杖,也分别通过“西南夷”地区,转运到南越和身毒(即印度,身读作捐)、大夏国(今阿富汗北部)。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汉武帝为了通过“西南夷”控制南越,派番阳令唐蒙率领一万多人,携带厚礼前往夜郎,说服夜郎王归附了汉朝,并在那里建置了犍为郡。不久,武帝又派司马相如出使邛、笮一带,在那里设置十余县,隶属蜀郡。后来由于通西南夷道,死了几万人,用了上亿的钱,过分地耗费了巴蜀民力,而汉朝对西南各族的封建统治又遭到各族人民的反抗,这才

把经营西南的事暂时搁置下来。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汉武帝为了开辟通往大夏、身毒的道路,又派张骞携带厚礼,分遣使者四路深入西南各族地区进行活动。西南各族的一些上层分子怀疑汉朝的动机不纯,皆闭关不与通。费了四年的时间,结果没有成功。

在中国北部蒙古草原一带有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叫做匈奴。秦汉之际,匈奴已形成统一的部落奴隶制国家。匈奴人对中国北部的开发,有过重要的贡献;但匈奴奴隶主贵族为了占有更多的奴隶和财物,经常向四邻掠夺。汉朝接近匈奴的郡县,更是匈奴掠夺的主要对象。有时,匈奴奴隶主甚至煽动和支持汉朝北方的一些诸侯王如韩王信、代相陈稀、燕王卢绾等人叛乱,对新建立的西汉政权造成严重威胁。汉七年(公元前200年),刘邦曾率领大军三十余万到平城白登山(山西大同东南)阻击匈奴,结果被匈奴骑兵打得大败。由于这时汉朝刚建立不久,经济力量不足,中央集权还不够巩固,实在无力对外。因此,平城之役以后,刘邦不得不把主要力量放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及解决地方诸侯王问题上,而对匈奴则采取暂时稳住的“和亲”政策^①,以便积聚力量,进行反击匈奴的准备工作。匈奴奴隶主贵族认为汉朝政府软弱可欺,更是连年侵入边郡,掳掠人口畜产。尤其是云中(治云中,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境)、辽东(治襄平,今辽宁辽阳县)一带,每年被匈奴杀害和掳去的

① 和亲,就是汉朝以宗室女为公主,嫁给匈奴单于(意为天子),每年赠送匈奴大量絮、缁、酒、食物等,并和匈奴约为兄弟。

人口在一万以上。匈奴“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①，西汉政府只能做适当的防御，而无力反攻。汉文帝时，在防御匈奴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他改革了边防军轮换制度，实行了“募民备边”的政策，移民充实边境，屯田筑城，奖励富人向边境输粟，增加粮食储备，大大加强了边防力量。他曾多次派兵抗击匈奴，并大力提倡民间养马，准备建立一支骑兵来对付匈奴的骑兵。汉景帝在部署防御和准备反击匈奴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终景帝世，（匈奴）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②双方力量的对比，开始发生了变化。

武帝即位以后，凭借着汉初七十余年间劳动人民所创造的大量物质财富，在文、景时期充分准备的基础上，秣马厉兵，决心要和匈奴奴隶主大干一场，以期彻底解除多年来的北方边患。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春，武帝诏问公卿曰：“朕饰子女以配单于，金币文绣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嫚，侵盗无已，边境被害，朕甚悯之。今欲举兵攻之，何如？”^③但是当时西汉政府中多数人都对匈奴怀有畏惧心理，仍坚持和亲政策，反对和匈奴作战。以大行令王恢为代表的主战派和以御史大夫韩安国为代表的主和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经过反复争论，汉武帝毅然采纳了王恢的建议，派遣马邑人聂翁壹引诱匈奴单于深入进兵，汉朝以三十万大军埋伏在马邑（山西朔县）附近山谷中，准备一举歼灭匈奴的主力。不料匈奴单于在中途发觉了这个诱兵之计，迅速撤兵，

① 《汉书·晁错传》。

② 《汉书·匈奴传》。

③ 《汉书·武帝本纪》。

逃回边境。从此以后，汉与匈奴彻底决裂，开始了长期而频繁战争。

武帝时候，汉对匈奴的大规模的战役共有三次：

第一次是在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这一年，卫青率领大军出云中以西，至高阙，迂回到陇西（郡治在狄道，即今甘肃临洮），击败了匈奴的楼烦王和白羊王，夺取马牛羊一百多万头，控制了河套一带地方。汉朝在那里建立了朔方郡（治所在今内蒙古杭锦旗西北）和五原郡（治所在今包头市西南），并且用了几十亿钱建筑了朔方城，招募贫民十万口，徙居朔方，作为边郡重镇。此后，匈奴屡遭打击，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匈奴单于王庭被迫迁往沙漠以北。

第二次战役发生在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率领骑兵几万人两次从陇西出击，一次越过焉支山（甘肃山丹县）一千余里，缴获休屠王的祭天金人；一次越过居延泽，攻到祁连山，斩获匈奴四万余人。汉军的胜利，引起匈奴贵族的内讧，匈奴浑邪王杀死休屠王，并其众归附汉朝。汉政府征发了三万辆车去迎接他们，赏赐费用一百多亿，最后把他们安置在沿边的陇西、北地（治马领，今甘肃环县东南）、上郡（治肤施，今陕西延安县）、朔方、云中五郡，称为五属国。以后黄河以西，自金城（今甘肃兰州）以西至盐泽（罗布淖尔），都没有匈奴的踪迹。汉朝先后在那里设置了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以上均在今甘肃境内，因其地在黄河上游以西，故又称河西四郡），切断了匈奴和氏羌各族的联系，打开了通往西域的道路。

过了两年，即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和匈奴又进